

第一章 企业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的理论和实践

从现在起到下个世纪的前十年是我国经济跨世纪的重要历史时期，我国经济将怎样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之路将怎样走下去，这直接关系到我国未来经济的兴与衰。为此，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把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实现今后十五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一，以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实现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既是一个目标，又是一个艰巨的过程。从目标来讲，它是一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任务；从过程来讲，它又是积小变到大变，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在转变过程中，从参与转变的市场主体看，主要是实现两大转变，一是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二是农户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本书正是从企业这个角度，探讨如何加快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最具体、最重要、最大量和最活跃的主体，是社会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单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将影响并促进经济体制转变的微观基础产生变化。经过近 20 年的改革和发展，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已经初步进入市场，并按照市场需求转换着经营机制，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在这一过程中已涌现出一批活力较强的典型，他们在各自的实践中，实现着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与此同时，仍有为数不少的企业还困惑于传统的粗

放型增长方式之中，陷于生产经营困境。在世纪之交的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在新的矛盾、新的机遇和新的发展思路交织而成的转折点上^①，企业能否抓住历史的机遇。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增强企业活力，实现集约经营，参与国际竞争，进而推动国家的工业化迈入新阶段，实现工业结构升级的目的，已到了十分关键的时刻。正是基于此，我们选择了这个明知十分艰难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作为本书的研究对象。

第一节 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

一、经济增长

1. 经济增长的解释

在西方经济学中，一直把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研究经济增长的中心问题。例如，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曾指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决定国民财富增长的主要因素有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劳动在全部劳动中所占的比重。李嘉图则认为，一定的利润率是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到了本世纪 30 年代，在凯恩斯建立的宏观经济模型基础上，以凯恩斯短期静态分析的国民收入决定论为理论框架建立起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先后出现了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剑桥增长模型，用来解释国民收入或产量长

^①参见《世纪之交的工业结构升级》，江小涓著，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版。

期发展的情况。马克思也分析过经济增长问题，他在《资本论》第2卷第3篇中揭示社会再生产理论时指出，在不断实现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实际也就同时实现了经济增长。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总是同数量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可以给经济增长下这样一个简单定义，就是：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由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或效率的提高等原因而引起的商品和劳务总供给量的增加。

实现经济增长，一般包括以下两层含义：一是商品和劳务的总供给量是增加的；二是人均占有的商品和劳务也是增加的。如果只有前者而没有后者，就不能算经济增长。美国经济学家吉利斯、帕金斯等在《发展经济学》中下的经济增长定义就包括了这两层含义。他们认为：“经济增长指的是国民收入或人均国民收入以及国民产值的提高。”^①

2.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对经济增长的含义的把握与界定，在不同的经济学家那里是不一样的。较通常的做法是在与经济发展的比较中给出经济增长的涵义。本书所给的经济增长涵义，也是一个既同经济发展相联系、又同经济发展相区别的解释。

早期的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穆勒、马歇尔、熊彼特等，都把一国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看作一国的经济发展。在他们的著作中，“增长”与“发展”是同义语、同一概念。形成这种观点的主要原因是把剩余价值的增长视同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一经济学思想影响深远，时至今日，仍有一

^①〔美〕马尔科姆·吉利斯、德怀特·H·帕金斯等：《发展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些经济学家往往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这两个概念。例如，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 1971 年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就会给经济增长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的相应调整基础上的。”^① 库兹涅茨的这个定义就已经包含了部分经济发展的内容。但在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中，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分别使用这两个概念。如何区分这两个概念呢？

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和赫立克认为：“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则既包括更多的产出，同时也包括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安排上的变革。经济增长不仅包括由于扩大投资而获得的增产，同时还包括由于更高的生产效率，即单位投入所生产的产品的增加；经济发展的涵义则不止这些，它还意味着产出结构的改变，以及各部门间投入分布的改变。正如人类身体一样，强调增长着眼于身高和体重；而强调发展则注重于机能上——素质上的改变。”^② 吉利斯、帕金斯等人也认为：“经济发展，除了人均收入的提高以外，还包括经济结构的基本变化。其中两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工业在国民产值中的比重上升和城市人口所占百分比的上升。”^③ 此后，经济发展的涵义又扩张到了社会、政治等方面的进展。因此，比较完整的发展概念应该解释为：经济发展不仅是指一般的经济增长，而且是指一个国家

①〔美〕库兹涅茨：《现代经济的增长：发现和反映》，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 2 辑，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②〔美〕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布鲁斯·赫立克：《经济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第 5 页。

③〔美〕马尔科姆·吉利斯、德怀特·H·帕金斯等：《发展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5 页。

随着经济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以及社会福利、文教卫生、群众参与经济及社会发展程度等等在内的各种结构的协调与优化。

经济增长只是经济发展中的一部分，但它却是其中最基本、也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因为经济增长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手段和基础，没有经济增长就不可能有经济的发展。但是，有经济增长并非一定就有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并不构成经济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例如，经济增长带来的不是整个社会和居民的福利的普遍增进，而是出现了收入与分配上的极端不公，即“如果经济增长仅仅使一小撮人获利，使少数富翁获利，无论这些少数人是外国人还是本国入，都不能算作经济发展。”^①

正因为经济发展同经济增长相比是一个内涵更为丰富的概念，著名的“勃兰特报告”一再强调不要把经济增长混同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并不一定会使一个国家大多数人的福利有所增加，发展中国家不应简单重复发达国家的成长道路。

3. 经济增长的度量

关于经济增长的度量，也是意见纷呈的。在我国，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主要是工农业总产值、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

工农业总产值是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生产的产品价值总和。由于工业和农业是两个最基本的物质生产部门，其产值大小能大致反映国民经济状况，有一定合理性，但该指标无法反映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部。社会总产值是指一国的各个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

^①〔美〕马尔科姆·吉利斯、德怀特，H·帕金斯等：《发展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年)生产出来的物质产品价值总和。该指标较之工农业总产值,更具有全面性,因而长期成为衡量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综合指标。但该指标存在严重的转移价值的重复计算的“水份”,同时用社会总产值作为主要考核指标,也容易造成浪费和经济效益的低下。由于社会总产值的这些缺陷,人们更多采用国民收入指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综合指标。国民收入是指一国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创造的全部新价值,它不包括生产资料的转移价值和重复计算因素,能较全面地反映一国经济增长的动态和实力。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收入的多少,基本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富裕程度。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适应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对外开放的需要,我国从1985年起开始使用和公布国民生产总值,把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综合指标。国民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所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和提供的劳务总量价值的总和。用此指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状况的综合指标,其意义在于:一是可以综合反映一国经济活动各方面的增长速度和水平,特别是能反映出第三产业的增长状况;二是便于我国同市场经济国家进行国际间经济增长水平比较。

二、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这一用语在国外经济学文献中并不多见。它是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学者在本世纪60—80年代分析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方向时提出的概念。这些经济学家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提示,^①把增长方

^① 参见《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2页。

式分为两种基本的类型，一种是依靠增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方式，另一种是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方式。他们认为原苏联增长方式的症结，在于主要依靠粗放增长而忽视集约增长，即主要靠不断大量地投入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经济增长。要扭转当时已开始出现的速度下降趋势与提高经济效益，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1971 年苏共 24 大正式提出经济向集约化为主的发展道路过渡。^①

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解释，一般认为，它就是指资源的总体配置方式，即决定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的组合方式以及各种要素组合起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劳动、资本、土地是西方经济学者公认的推动经济增长的三种基本要素。此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经济制度也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为了增加产出，怎样把劳动、资本、土地、技术、制度等增长要素很好组织起来，同时很好地使用，求得同样的投入有更多的产出，或同样的产出用较少的投入，这就是我们研究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问题。

经济增长方式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分类，但基本的分类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生产规模扩大的实现方式看，可以分为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两种类型；另一种是从经营的角度看，可以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类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与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的。在生产技术水平较低条件下，一般以外延式、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为主；而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则内涵式、集约型所占的比重会随之不断提高，并逐步

^①苏联以外的研究者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称呼是不同的，R. W 坎佩尔把它叫做发展战略的模式或处理增长问题的方式；E·休伊特把它叫做增长类型；J·柯尔奈把它叫做增长方式。

占据主体地位。因此，任何国家或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都会存在一个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我国在现阶段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一种客观必然，它不仅有效解决当前经济生活深层次矛盾的迫切需要，也是显著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正是基于此，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从经营角度明确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要实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历史任务。

三、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

1. 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的提出

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的划分最初出现在农业领域，最早来源于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在书中他把级差地租划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假定第一、二、三等土地使用等量资本和等量劳动时所产净产品分别为一百、九十、八十夸特谷物。在一个新开辟地区中，肥沃的土地相对于人口而言很丰富，因而只需耕种第一等土地；……一旦人口增加到了一定程度，以致必须耕种其上所能取得的产品在维持劳动者的生活只有九十夸特的第二等土地时，第一等土地就会有地租；……同样，当第三等土地投入耕种时，第二等土地的地租必然是十夸特，而第一等土地的地租则增长到二十夸特。”这就是由粗放经营产生的粗放地租。另一种情况是“在第二、三、四、五等或更差的土地投入耕种以前，人们能使资本在已耕土地上生产出更多的东西来。我们发现，把用在第一等土地上的原有资本增加一倍，产品虽然不会加倍或增加一百夸特，但却能增加八十五夸特。这个数量超过了在第三等土地上使用同量资本所获得的量。在这种情况下，资

本就宁可用在旧有土地上而且同样会产出地租。”^①这就是由集约经营产生的集约地租。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继承和发展了李嘉图关于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思想，但也仅限于农业领域。他认为，发展农业生产主要是靠扩大耕地面积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在同一块土地上连续追加投资，采用先进技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经营方式就是集约经营。^②根据这一论断，此后的中国经济学家几乎无一不把粗放型和集约型同农业增长方式联系在一起。如《辞海》中对它们的解释是：粗放经营即集约经营的对称，以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投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浅耕粗作的农业经营方式。粗放经营主要是用扩大耕地面积的方法来提高产品总量。^③集约经营即粗放经营的对称，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或劳动，采用新的技术措施，进行精耕细作的农业经营方式。集约经营是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方法来增加产品总量。^④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均有大同小异的解释。^⑤

从经典作家和我国传统经济学对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的理解可以看出，经典作家和我国传统经济学家认定的粗放型和集约型增长大多仅限于指农业的不同增长方式，而对农业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解释又同土地利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衡量

①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 1976 年版，第 58—59 页。

② 参见《资本论》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39、40 章。

③ 参见《辞海》（下），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428 页。

④ 参见《辞海》（下），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604 页。

⑤ 参见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下），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25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81、683 页。

集约经营的指标就集中体现为土地生产效率。

对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的分析长期仅局限在农业领域既有历史局限的原因，也有对经典作家的思想理解不够全面、^① 坚持教条的原因。这种现象直到社会主义国家到了 70 年代，才把经济增长的方式区分为粗放型增长方式和集约型增长方式，^② 并把集约型增长看作是发达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此后，对经济增长方式采用粗放型和集约型的划分才逐步流行开来。

2. 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的解释

对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的解释虽有不同争论，但其解释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一般都同资源总体配置或生产要素的利用方式相关。粗放经营隐含的前提是“经济资源供给充裕”，“只要多投入就要多产出”，因此，它的着眼点是扩大投入，而忽视投入的使用效率。集约经营隐含的前提是“经济资源总是稀缺”，因此，它的着眼点是要求提高每种生产要素的有效性，并通过它们的优化结合而达到全面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目的。因此，粗放型增长就是指主要依靠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投入来增加产品的数量、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而集约型增长是指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来增加产品的数量和提高产品的质量、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

应当注意的是，任何时候的经济增长都是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纯的粗放经营和单纯的集约经营在现实经济增长中都是不存在的。因为，在实践中二者都有各自的存

^①例如，在我国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中，“内涵”或“集约”、“外延”或“粗放”本来分别是来自同一个词中翻译过来的。

^②社会主义国家在 60 年代开始探讨经济增长方式时，仍只将经济增长方式区分为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两种。

在理由，只存在以粗放型为主的增长方式和以集约型为主的增长方式。同时，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产业所能达到的集约化程度也是不同的。例如航天工业的集约化程度可以很高，轻纺工业的集约化程度会相对低一些。因此，我们必须伴随着经济发展状况正确把握二者的关系。这正如国际劳工组织出版的《生产率管理实用手册》一书的“前言”所指出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要同时考虑两个问题：努力去更有效地使用人力资源和资本资源。在每个国家里，真正的问题是找到经济发展的粗放经营方法和集约经营方法之间的最佳平衡。”^①

3. 衡量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的指标

全面正确估计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标准应该是：经济的增长额在多大程度上是靠提高生产要素投入的效率实现的。根据这一标准，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出率可以作为衡量粗放增长程度和集约增长程度的指标，但这两个指标都只能近似反映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的水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般认为，劳动生产越高，集约增长水平越高；资本产出率越低，集约增长水平越高。但是高劳动生产率并不一定都意味着集约水平高，如果高劳动生产率是由过高的资本投入带来的，那么这种劳动生产率就不是集约化。至于资本产出率，也有局限性，因为它只考虑了资本投入的效率，而未考虑劳动力投入和其他投入对产出的影响。因此，要科学认识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水平，应该把总产出同所有生产要素投入进

^① 参见约瑟夫·普罗科潘柯：《生产率管理实用手册》，中国劳动出版社1993年版。

行比较计算出的总要素生产率^①作为准确反映的指标。由于总要素生产率指标同时考虑了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和其他投入产出对产出的影响，是衡量生产效率较为全面的尺度。因此，目前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增长的源泉时都沿用了丹尼森的方法，先把经济增长的源泉分解为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和总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然后再对生产要素投入的各个构成部分以及导致总和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各个因素的贡献作具体分析。

第二节 我国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估计及其成因

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历史考察

建国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95 年同 1952 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262.31 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13.5%；农业总产值增长了 4.80 倍，年平均增长率为 4.07%。从 1978 年到 1995 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 3.89 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9.2%。^②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主要工农业产品总量在世界上的位次也大大提前，谷物、棉花、煤、水泥、电视机等主要产品的产量已跃居世界第一位。从纵向比较看（见表 1—1），1985—1994 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 7.8%，在世界银行统计的 133 个国家或地区中，

^①总要素生产率指标是由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在计算美国、西欧和日本不同要素对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时首先使用的。

^②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年份数据计算。

位居第二，仅次于泰国，与韩国持平。

表 1—1 1985—1994 年世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情况①

主要国家或地区	中国	印度	美国	法国	日本	巴西	泰国	全世界
1985—1994 年年 平均增长率 (%)	7.8	2.9	1.3	1.6	3.2	-0.4	8.6	0.9

表 1—2 按五年计划期计算的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②

时 期	国民收入 增长率 (Y')	劳动投入增 加的贡献 (aL')	资本投入增加的 贡献 (1-a)K'	综合要素生产率 增长的贡献 (A')
“一五”	8.9 (100.0)	0.84 (9.4)	5.04 (56.6)	3.2 (34.0)
“二五”	-3.1 (100.0)	0.51	7.07	-10.68
恢复时期	14.5 (100.0)	1.02 (7.0)	3.57 (24.6)	9.91 (68.4)
“三五”	8.5 (100.0)	1.11 (13.1)	4.13 (48.6)	3.26 (38.3)
“四五”	5.4 (100.0)	0.63 (11.7)	5.53 (102.4)	-0.76 (-14.1)
“五五”	5.9 (100.0)	0.63 (10.7)	5.32 (90.2)	-0.05 (-0.9)
“六五”	9.8 (100.0)	0.99 (10.1)	4.97 (50.7)	3.84 (39.2)
“七五”	8.2 (100.0)	0.78 (9.5)	6.23 (76.0)	1.19 (14.5)

注：不带括号的数字为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率所贡献的百分点，括号内的数字为贡献的百分点占总增长率的百分比率。

计算方法：首先根据“全社会劳动者人数”（《中国统计年鉴》1990年第113页。1990年人数是根据“七五”前四年平均增长速度外推的）及“资

①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190—191页。

②资料来源：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第14页。

本总量”分别计算出各时期劳动投入和资本增长率。其次，劳动投入增加的贡献等于劳动投入增长率乘 0.3，资本投入增加的贡献等于资本投入增长率乘 0.7，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等于国民收入增长率减去劳动投入增加的贡献及资本投入增加的贡献后的余额。

从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来看，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表 1—2 是按五年计划期计算的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建国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演变不是简单地从粗放到逐步扩大集约因素的过程，而是一个曲折、迂回、粗放与集约交替的波浪式过程。在这一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过程中，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经历了从粗放——集约——粗放——集约——粗放的波动。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52 年的三年恢复时期，为了医治战争创伤，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这一时期主要是利用生产要素数量的扩张来恢复原有生产能力，实现经济增长，它不同于发展新的生产力，是属于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这在当时无疑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也是当时政府所能采取的在最短时间内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最行之有效的办法。

三年恢复时期完成后，我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据党中央提出的“一化三改造”总路线，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中心环节，优先发展重工业，集中力量建成了 156 个重点项目，新建和扩建了电力、煤矿、石油、钢铁、汽车、飞机等工业，到 1957 年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得以初步建立起来。这一阶段虽有生产要素数量的大量扩张，但十分注意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集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中占有相当的比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贡献率达到 34%。从 1952 年到 1957 年，全国工程技术人员数量增加了 2 倍；工人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61%，平均每年提高 9.9%；12 个工

业部门的工业产品成本降低了 29% ,平均每年降低 6.5% ;工业生产能力迅速增长的同时,工业技术水平也得到显著提高。

“一五”计划完成后,国家开始执行“二五”计划。在左倾思想指导下,综合平衡、稳步发展的方针被否定,错误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单纯追求速度,忽视客观条件和经济规律,盲目进行高投入,造成大量人、财、物力的浪费,经济效益低下,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几乎完全是靠投资增加而产生的。1958 年的积累率高达 33.9% ,同年实现的社会总产值增长率为 32.7% ;1961 年的积累率虽迅速下降到 19.2% ,但同年实现的社会总产值增长率为 -33.5% 。因此,不顾生产技术,不顾生产效益和要素利用效率的增长方式,最终使整个“二五”计划期间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 -3.1% ,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增加的贡献虽分别使国民收入年均增长 7.07% 和 0.51% ,但综合要素生产率增加的负贡献却使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呈现为 -10.68% 。

为了解决“二五”计划存在的问题,国家进入三年调整时期。本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国家重新把经济效益放在了首位,并着手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充实急需,加强薄弱环节,狠抓产品质量,注意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力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重工业生产,加强企业管理,坚决对一部分亏损和效益差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经过不懈努力,国民经济根本好转。到 1965 年社会总产值增长率已恢复到了 19% 。这一时期,国家压缩了生产规模,不再追求单纯的速度增长而重视提高生产要素使用效率和资源合理配置,从而使恢复时期成为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 14.5%)和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贡献度最大的时期(达到 68.4% ,已与发达国家水平相近)。可惜的是,这一集约增长趋势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被迫终

止。

从 1966 年到 1978 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政治上、理论上的混乱给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干扰和破坏，国家的工作重点完全脱离经济建设，在“政治挂帅”的指导下，原本正确的经济方针受到批判，企业合理的管理规章制度遭破坏，加上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改变，造成投入多、产出少，经济效益全面下降，呈现出典型的粗放型增长特点。在 13 年中最为典型的是“四五”时期，五年中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仅高于“二五”时期，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贡献度为 -14.1% 。

1979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六五”计划完成止，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中国经济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注意了技术、制度等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使得这一时期集约增长因素大大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贡献度大大提高。如“六五”计划期间，在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 8.2% 中，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所贡献的百分点达到 3.84 ，占总增长率的 39.2% 。

从 1986 年以后，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些原因在以后将有详尽分析，这里略去），粗放增长的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有不断强化之势，使得经济效益不佳的状况长期得不到解决。如表 1—2 中，1986—1989 年综合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率贡献的百分点占总增长率的百分比率从“八五”时期的 39.2% 迅速下降到 14.5%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才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历史任务。

第二，从建国后的各个历史时期看，恢复时期粗放增长因素和集约增长因素都占有相当比例，但从总体上看，建国后我国的经济增长是一种以粗放型为主的增长方式。这体现在：一是建国后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以资源、资金的高投入而取得的。从 1952 年

至 1990 年，中国的平均积累率达到 28.5%，其中积累率最高的 1959 年达到 43.8%。这样高的积累率，在世界各国都是罕见的。二是从建国后到现在的大多数时间里经济增长都表现为比较典型的粗放型特征，技术进步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较低。80 年代，有学者对我国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 1952—1982 年生产投入要素和技术进步对产值增长速度的贡献进行分析，得出技术进步在产值增长速度中的贡献仅为 27.8%。

第三，粗放增长因素和集约增长因素除了个别历史时期外（如“二五”和“四五”时期就没有集约增长因素），都贯穿融合于各个历史时期中。粗放中有集约，集约中也有粗放。如在“一五”时期，在大量投资的同时，十分注意采用新的生产技术装备，推广了不少先进的生产工艺和管理经验。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1960 年上半年大跃进的一大特点是大搞全民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从单项技术革新到全行业技术改造，从工具设备、生产方法的改革到新产品、原材料的技术革新，取得了一些有效成果。“文革”时期，工业中也建设了一批技术先进的大型工业企业，其中的石油工业发展最为突出；另外，还研制成功了一大批重大新产品和配套设备，例如 33 万伏高压输电变电设备等。

二、当前我国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估计

当前我国企业经济增长同整个经济增长一样，总的来看基本上仍沿着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其根据在于：

第一，在企业经济增长中，主要靠高投资、高积累，以支撑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建国以后，我国企业经济增长速度迅猛，从而迅速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如工业总产值在 1952—1995 年的 44 年中增长了 262.31 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13.5%，其中